

Geschichte der Gestapo

盖世太保史

[法] 雅克·德拉律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盖世太保史

〔法〕雅克·德拉律 著

黄林发 萧 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acques Delarue

GESCHICHTE DER GESTAPO

根据 Hans Steinsdorff 的德译本

“Geschichte der Gestapo”

(Athenäum-Verlag, 1979) 转译

盖世太保史

【法】雅克·德拉律 著

黄林发 萧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00,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3,000 册

书号: 11188·35 定价: 1.4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雅克·德拉律是法国有名的自由撰稿作家。他生于一九一九年，曾长期担任法国警官，一九五三年起从事写作工作。

本书出版于一九六四年，并于同年由德国翻译家汉斯·施泰因斯多夫译成德语，之后又被译成数国语言相继出版，成为研究德国现代史的不可缺少的史料之一。

本书专门记述了从希特勒上台到德国法西斯崩溃这十二年的历史，重点写当时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历史的全过程。此外，作者还用大量的历史论著、档案文献以及他个人的亲身感受揭露了纳粹各个组织之间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种种丑行。由于本书作者曾长期担任法国警务工作，因而所选择的史料十分丰富，既有当时德国战犯的口供笔录，又有许多目睹者的铁证材料。对研究德国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其对研究盖世太保的来龙去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译本第一至第五部和附录由黄林发翻译，第六部由萧弘翻译。个别处略有删节。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译文有不妥之处希读者批评指正。

纪念

那些死于盖世太保和纳粹手下的各种族和
各国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纪念

那些为荣誉、真理和自由而牺牲的人们。

前 言

盖世太保(GESTAPO)^①——这四个字使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颤抖了整整十二年。成千上万人的身后跟踪着特务，特务们在这块“公司招牌”下进行活动；数百万人受尽了他们及其同伙党卫队的打击而丧命。

虽然，内容丰富的成百本书籍都对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作了最细致的研究、分析和评论，但是在第三帝国崩溃十九年后的今天还缺少一部描写盖世太保全部历史的著作。当时，盖世太保是这个纳粹国家的主要台柱。只有认识这个国家的内部机构，才能了解那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盖世太保这个机械装置几乎每时每刻都是在庞大的警察机器的这个或那个传动机的带动下运转的。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几乎未曾有过这么庞大和完整的组织。它拥有的权力和给人民造成的可怕而恐惧的影响，竟会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境界。

因此，在人们的记忆中，盖世太保乃是丧尽天良、滥用社会安全工具的一个例证。这就向我们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机关不去为民族服务，而是去替一个私党效劳，那会把国

^① Gestapo为 Geheime Staatspolizei 的缩写。原意为秘密（国家）警察。——译者

家引向何处！本来把权力和武器给予他们，是为了保护公民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然而现在权力和武器却成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和置人于死地的工具。罪魁集团的专政，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被摧毁了，威力强大的政权的末日来到了。

我的意图是要“拆开”这台巨大的机器，打开它的各个发动装置，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看，纳粹政权之所以能巩固和维持，只不过是依靠这样的装置来支撑和保护他们大厦的最小部分。人们可以看到，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无数分支是如何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把那些被奴役者紧紧地箍在狭窄的网套里，致使任何行动、甚至任何思想都逃脱不过他们的监视。

今天，人们对于那些掌握全部指挥棒的人物和这台机器的本身所知甚微。我认为，揭露这些人的罪恶和罪状以及他们的实质，还其本来面目是完全必要的。是啊，这些怪物本来也是与其他人一模一样的，其中有些人所表现的特性几乎是完全可以克制的。他们的命运之所以拐进了一个新的奇异的方向，是因为希特勒主义向他们灌输了新的奇怪的“道德观念”。他们抹煞了自己的良心，完全屈服在纳粹的教条之下。

我手头的这本书是根据两种资料撰写而成的：一是利用了大量尚未出版的材料，其次利用了所附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出版物。

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年这十年里，法国对盖世太保特务和战犯进行了起诉。在此期间，我记录和收集了大量的私人材料。

就在那时，我有机会亲自认识了曾在法国领导过德国警察的大多数人。我当时理解到，他们无非也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一些智力迟钝或者聪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性格，全是一些意志不坚的人。他们除了服从命令之外，不能区别善与恶的概念。

大多数囚犯不感到内疚。他们似乎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的处境。在他们看来，从刑事上追究他们所犯的罪行，只不过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一次报复行为。再说，正因为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所以他们（看来是无意识地）容忍了自己所处的命运。这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相符合的。那些最会看风使舵的人想用泄露机密的方法或通过向战胜者效劳的设想来赎回他们的生命。马絮是盖世太保一个“辅助队”里最臭名昭著的拷问者之一，他被监禁在弗雷斯纳已有好几个月。他在监狱里起草了一个玩具厂的规划，他打算在释放后去西班牙开办这么一个工厂。对于释放，他是毫不怀疑的，并认为不久即可兑现。

通过这些直接的接触，我尽力把在法国活动的大多数特务的脸谱勾画出来。

我利用他们的叙述和回忆，不仅是为了把盖世太保整个组织机构及其在法国的培训基地的情况告诉人们，而且也是为了把迄今为止很少为人所知的某些事件的背景原原本本地公布于众。此外，国家法庭、其他法庭和军事法庭对通敌案件的审理记录也同样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出版物中对我最有用的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主要战犯案件时的那三十二卷记录文件以及有关的十七本卷

宗。此外，我还利用了法国政府的某些出版物。关于纳粹组织的行政机构及其职权的叙述，均根据纳粹党和第三帝国国家机关出版的文件。这些文件也为我提供了有用的传记性的文献资料。

在不到十年的研究期间，我有幸获得了不少鼓励和宝贵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鼓励和帮助，我很可能难以完成我给自己布置的这个任务。

请所有在我著书立说的道路上支持过我的人，接受我真诚的感谢。我特别要感谢对我无限友好的内政部图书馆女馆员利斯博纳小姐；乐意为我开放私人图书馆的检察官M·夏莱；司法部的案卷保管员M·迪朗巴尔泰；近代资料图书馆的案卷女保管员阿德勒·布雷塞小姐；M·约瑟夫·比利和当代犹太资料中心的全体人员，该中心的档案对我非常有用；M·米歇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委员会以及在作战部历史档案馆负责德国资料的女保管员弗雷西热小姐。

在撰写盖世太保的历史以前，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纳粹在夺权道路上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事实上，我们不能把盖世太保与纳粹主义割裂开来，在本质上，它们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纳粹主义是从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后果的变态心理中产生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当德国不得不承认它被打败的时候，军人们却拒绝承认这种不应得到的失败。

普鲁士军官集团所统治的德皇陆军骨干力量，长久以来维持着军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发展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一些自认为是德国当然主人的将军们不愿意接受帝

国的投降思想，也不想从中吸取教训。他们开始散布一种说法，说什么军队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被出卖的。这种“背后一箭”说^①从此就诞生了。不过他们忘了说，德国部队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虽有一百八十四个前线师，但实际拥有的还不到十七个后备师，其中只有两个新补充师。与此同时，同盟国的军队有二百零五个师驻扎在前线，还有一百零三个后备师，其中六十个师是新编制的，而且美国增援部队与日俱增，德国在上月（十月份）已从南线退却下来。十一月六日，奥地利全面崩溃。德国成为孤家寡人。十一月三日，舰队的第五分舰队在基尔哗变。十一月七日巴伐利亚举行起义。国王路易三世不得不让位。十一月九日，在斯巴召开的军事扩大会议确定，德国参谋总部已失去主动权并决定请求停战。首相下台，皇帝逃往荷兰。但是，留下三名文职人员：巴登的马克斯亲王，新帝国首相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天主教主教埃尔兹伯格，他们不得不含垢忍辱进行停战谈判。同一天，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在国会的阳台上宣告共和国成立。

这个在苦难中诞生的年轻共和国很快使军人感到憎恶，失败的苦味还没有消逝，他们就开始谈论起“背叛”来了。

德国陷入一片混乱。旧的等级制度的金字塔倒塌了。失业和贫困使得混乱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为了恢复秩序，不得不有求于军人的援助。他们成立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团体，什么“自由团”和“战斗队”，那是一种私人性质的军队，只

^① “背后一箭”说(Dolchstoßlegende)，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种谬论，认为德国战败是由于“后方的背叛”，即革命所致。——译者

承认军官领导一切，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这些战斗队镇压地方上的起义，在他们建立新的军队的骨干——国防军之后不久，便捏造种种罪名来加罪于共和政体。

与此同时，军人们公开他们的政策或者他们所认为的政策，并在巴伐利亚军区司令部的范围内创办了“政治训练班”。创始人之一就是罗姆。

一九一九年初夏，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上等兵结束了“政治训练班”的学习，被分配在连队接受“军官教育”。德国军人在纳粹主义诞生时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与一些实业家勾结在一起，竭力恢复和豢养那些散布反民主思想、颂扬军国主义、煽动当时已完全消失的反犹太主义的小社团。

看来共和政府很相信魏玛宪法的优越性，因而对这些煽动性的阴谋估计不足。一九一九年八月的宪法无疑是合乎民意的，但骨子里却包含着将来有朝一日可被用来扼杀共和国的几项条文。

新政权的敌人很快就明白，与其发动正面攻击，倒不如采用渗透方法。他们表面上装作信仰共和政体，以便把指挥棒紧紧地握在手里。社会民主党的作战部长诺斯克非常认真地说道：“我借用年轻的共和国的军队给你们带来了自由与和平。”

共和国的敌人在这些花言巧语的掩盖下继续从事阴谋活动。他们在“贵族俱乐部”里用恰当的语言来装饰他们的理论，并通过格莱辛男爵主编的机关刊物《循环》进行传播。这份刊物这样说，自从革命以来，国防军的军官们早已学会

了如何去区别国家本身与其外部的形式。军官们愿意为永久性的、抽象概念的国家效劳。

因此，这一切已十分明白，只要国家不符合军官们的政治观念，他们就不再负有义务去为这个仅仅还是一种“外部形式”的国家效劳了。不久有人开导他们说，他们有义务迫使国家接受他们的法律。

恩斯特·罗姆上尉和他的同伴们也许理解了这些教导。他们准备在未来的事业上恢复旧制度，建立一些民间组织。这样可以使政府高枕无忧，逃避各种有效的监督，并使这些组织在有人对它们进攻时卸掉责任，经过改头换面，然后东山再起。目前要把所有这些受到同样意志鼓舞的、只是表面上涣散的力量团结在一个领导下，看来似乎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九一九年九月，这个“教导军官”阿道夫·希特勒参加了其中一个叫安东·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的组织。他很快控制了德莱克斯勒的这个小党，并在罗姆帮助下于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把它改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该党还把其他三个社团的成员吸收进来。它们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鲁道夫·荣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施特莱彻的德国社会主义党。纳粹党成立时只有六十八个党员，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发展为三千名党员。该党常常用醒目的大红标题进行积极的宣传鼓动战，其中有军人所编造的“十一月罪犯叛变”的神话，所以该党成长迅速。此外还成立了打手别动队，他们用拳头或橡皮棍子来堵住那些敢于在党代会上发言的政敌的嘴巴。“冲锋队”就

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它的简称是 SA。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党赢得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党员：赫尔曼·戈林上尉。他是一位战功赫赫的飞行员，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位指挥官，也可以说是盖世太保之父。

纳粹党的最佳宣传员都是军人。同时，他们也是冲锋队的干部，为此罗姆就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支军队很快威胁着政府，甚至在人员力量方面超过了国防军。

但是，那时候冲锋队还谈不上与国防军分庭抗礼，因为国防军支持冲锋队，向他们提供武器、“秘密”干部，有时还提供经费。一九二三年四月，冲锋队占据了军队的秘密军火库，同年九月，第七军区司令官洛索夫将军拒绝服从陆军司令部首脑冯·西克特上将的领导；他宁可被解除司令官的职务，也要藐视西克特的关于禁止在慕尼黑出版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命令。

纳粹的观点容易被军人接受，同“训练班”的论点极其相似：取消议会制，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而这个国家则由一位负责的、通过表决直接求教于人民的首脑来领导。宪法可以不要，因为它是无用的框框，会阻碍发展。这个国家决不容许政敌无休止地捣乱，它将消灭他们。不要反对派的报刊，也不要“背叛”，不要破坏权力机构的反对党。除了“民族利益”外，什么都不要。

这些纳粹党人的全部阴谋就在于他们把执政党和祖国相提并论。这是一出军人们习以为常的魔术戏。用保卫祖国

(即所谓保卫党)来为种种行径辩护。个人是不复存在的,他只能作为一个愿为集体牺牲一切的成员而存在。最重要的是铁的纪律和对元首无条件的服从。因此,对知识分子必须实行监督,如果他们对国家,即对政权有所危害的话,就要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

除了这些观点外,还有纯血统的、北欧血统的种族论的论点;有日耳曼“优等民族”的优越性的论点;有把他们的法则强加于劣等人的那种必要性的论点;有变种或劣等种族的论点;有在“自然法则”中得不到博爱和同情的那种“人性愚昧”的危害性的论点。

当纳粹党利用宣传取得进展时,其他社团也在拼命地夺权。失败的政变进行过多次,如卡普政变和布赫鲁克少校在库斯特林的哗变都诱惑着希特勒去冒暴动的风险。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希特勒想方设法联合鲁登道夫将军去说服敌视帝国政府的、闹分裂的巴伐利亚政府同他们一起进行武装暴动,推翻魏玛共和国。然而,由这位自封的新帝国政府元首一手操纵的这场运动在数小时之后就失败了:十一月九日清晨,“战斗联盟”中的三千人向元帅大会堂附近的慕尼黑军区司令部进军,但是在大批警察的卡宾枪的射击下,几分钟内就失败了;十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希特勒被逮捕;他身旁的戈林受了重伤,但是他却侥幸地到达了奥地利。

事后还有一个人,他曾经作为“德国战旗”(一个由罗姆发起的组织)的旗手参加了这次事件。他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

德国政府并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未遂政变和希特勒的被捕，而是错过了结束纳粹主义的机会。

这次诉讼案件出丑以后，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这对叛逆罪来说是最轻的惩罚。因此，他希望在缓刑期内能被提前释放。那些被告在伙伴们的热烈掌声和国歌声中坦然地离开了法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希特勒经过十三个月零二十天的监禁以后，从要塞里给释放了出来。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合法的途径才能上台，就是说既要把暴力掩饰起来去破坏法律，又要保护好得力的助手，既要假装遵守民主章程，同时又要从内部来破坏民主。

这种需要耐心的挖墙脚的工作可能要很长时间。回想起那些极右政党和纳粹党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选举中遭到惨重失败，并且在实际上不得不于一九二五年初重起炉灶时，确实令人感到满意。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的八年时间内，左派政党在选举中连连得胜，赢得了三百三十二万九千张选票，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是这只不过是相对的胜利，因为就在那个时候，纳粹党人通过宣传成功地把一大批年轻的选民争取了过来（一九三〇年拥有新选举权的人数达到三百万）；与此同时，极右派、右派和中立派的选民成批地倒向纳粹党人一边。所有正直的、传统主义的以及胆怯的人都学会了一些出口伤人的话，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话在纳粹的语言里却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九二五年二月，当选举年迈的元帅兴登堡为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正是这些正直的人对共和国进行了首次抨击。共和国的敌人

一方面掩饰着自己既往的荣誉，另一方面在大部分重要岗位上安插亲信。

纳粹党人及其同伙利用假牌玩弄民主游戏，把魏玛共和国的整幢大厦推向崩溃的边缘。他们不停地使政府产生危机(采用接二连三的选举法)，把民主政权的一大批拥护者争夺了过来，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纳粹的宣传。左派政党面对这种战略，不能团结一致，不能放弃内部斗争来公然对抗共同的敌人，不能抓住无数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可赢回主动权的机会。就一些邻国而言，首先指的是昨日的胜利者法国和英国，他们也许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们不仅在纳粹“夺权”的时期里，而且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年代里都表现得非常暧昧和盲从。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兴登堡干脆辞退了勃鲁宁首相，任命“男爵”和国防军的代表弗朗兹·冯·巴本为他的继承人。从此开始了纳粹掌权的最后阶段。托马斯·曼在谈论德国小市民时说过，他们害怕陷入无产阶级的深渊，所以欢迎巴本上任。对他们说来，兴登堡这位年迈的元帅倒是一位天赐者，是他们阶级的救星，而且他的每一项决定都是英明的。

六月十四日，巴本上任还不到两周，就取消了勃鲁宁曾明智地颁布过的解散冲锋队、禁止穿希特勒制服的禁令。从此以后，巴本的作用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了。一九三二年九月初，德国军官国家联盟大会在柏林召开。德国国民议员埃弗林站在讲台上坦然自若地说：“巴本总理为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帝国，为扫除魏玛共和国大厦的最后一堆瓦砾而呕心

沥血。”

巴本赶走了国内共和政体的高级行政官员，并用“国家党人”取而代之。只有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所支持的普鲁士的勃劳恩—泽韦林政府起来反抗。但是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帝国总统在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基础上颁布的一项简易法令，就把普鲁士政府赶下了台，其理由是，普鲁士警察无力“恢复安定和秩序”，就是说无力制止纳粹党人的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

巴本开辟了通往政权的道路，纳粹党人选择了这条不流血的道路。一九三二年七月的选举使他们获得了二百三十个议席；他们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八月三十日，戈林被选为国会议长。从此，最后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策略问题了。

右派政党也好，军人也好，当他们暗中向纳粹提供方便时似乎没有考虑到会带来这个必然结果。他们全都主张传统性的政治法制，而忽视了政权会有落入纳粹分子手中的可能性。他们只认为纳粹分子没有能力实行单独统治。为了使传统性的价值再次发挥作用和夺回特权，他们只想利用纳粹党人的冲力，跟在他们后面随波逐流，他们为了得到这种帮助准备让纳粹党人参加政府，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希特勒的预言：“只要有我们存在的地方，就无他人立足之地。”等到他们理解到这句话的严重性时，已经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带来了许多血迹斑斑的经验教训。

一九三二年七月被巴本扶上台的纳粹党人在十一月份面临着一次意想不到的选举，他们在选举中失去了二百万